

2/19

廣東文史資料

第二十二輯

(内部发行)

附第20-21輯



7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廣東文史資料

第二十二輯

Y198/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八·广州

广东文史资料

第二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1/32·8.125印张

1978年11月第一版

1978年11月第一次印刷1—10,000

书号：11111·39 定价：0.80元

目 录

回忆周恩来总理大革命时期在广东的革命活动

..... 谭天度、罗明等 (1)

关于周总理的二三事 曾敏之 (32)

我在新四军的亲历和见闻.....林植夫遗稿 (38)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加北伐战争的回忆

..... 邓演存、林祥、林伟俦等 (125)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参加北伐的回忆

..... 梁秉枢遗稿 (167)

我所知道的邓演达 陈卓凡遗稿 (181)

中越革命志士组织“振华兴亚会”

进行抗法斗争的回忆 邓警亚遗稿 (205)

附录一：《潘佩珠年表》摘编 (220)

附录二：潘必遵在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 (233)

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

..... 程一鸣 (236)

编者的话..... (252)

回忆周恩来总理

大革命时期在广东的革命活动

谭天度 罗 明 林务农 苏 怡
萧隽英 曾天节 刘志远 郭瘦真
林增华 吴宗太 魏鉴贤 胡一声
梁若尘

编者按：今年初以来，我们陆续收到一些有关周恩来总理进行革命斗争事迹的史料。提供这些史料的都是目前在广东省政协任职或兼职的老同志、老先生，他们热烈响应中央关于抢救革命历史资料的号召，并以对总理无限敬仰和深切怀念的心情，把自己当时所耳闻目睹的情形和感受点滴记录下来。虽因相隔时间长，记忆难免不尽翔实，但其中许多资料还是相当宝贵的。我们把其中有关在大革命时期周总理在广东进行革命活动的部分稍加编辑，在这里刊出，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一、从法国回到广州

林务农：一九二四年大约初夏时候，周恩来同志从法国抵达香港，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罗振声同志。当时广东党组织派黎轻发同志前往香港迎接。周恩来同志乘搭来往香港的“佛山轮”到广州，彭湃、阮啸仙等同志到长堤佛山轮码头迎接。彭湃同志着我随同前往码头携取行李，并雇人力车把周恩来、罗振声两同志接到彭湃同志住处居住。当时彭湃同志住处是文明路与文德路交叉路口的贤思街，大约是七十一号左右，是一间二楼，有一厅两房和厨房、洗澡间。恩来、振声两同志住前房，彭湃、林甦同志住后房，我晚上在客厅里摆帆布床睡觉。记得恩来同志住在那里时，每天晚上有空就给我们讲述法国的政治、经济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十多二十天后，彭湃同志另在东皋大道租了一间小楼房，我们便搬了出来，让恩来同志继续在贤思街居住。

谭天度：一九二四年初，孙中山先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实现国共合作。接着，中国共产党两广区委员会也在广州宣告成立。书记是陈延年同志〔注〕。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区党委下面设有工运、农运、妇运、青运、学运和组织、宣传等工作机构。当时在各

部门工作的同志有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蔡畅、恽代英、黄平、谭平山、谭植棠、彭澎、阮啸仙、刘尔崧、杨殷、黄学增等。周恩来同志是在区党委成立以后，才从法国回来的。他回来以后，即担任区党委常委，和陈延年同志一起，积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由于周恩来同志特别重视军队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军运工作迅速开展。此外，当时由于孙中山实行国共合作和联俄政策，以广东为根据地，革命搞得轰轰烈烈，许多东南亚国家，如印度、缅甸、泰国、越南等都派人来中国学习，当时广州曾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为了加强同东方各国的革命联系，扩大革命声势，提议同各国派来的人员共同建立一个组织，叫做“民族解放大同盟”。这个提议得到东方各国的响应，共同发表了宣言。我记得，当时越南的胡志明同志，印度的路易同志都参加了，朝鲜大概也有人参加，印尼、菲律宾是否有人参加，我记不大清楚了。中国党主要是派周恩来同志去参加，成立大会是他主持的，我也参加“同盟”中的工作。当时开会做报告，多数在东皋大道大会堂（原是没收大买办、商团反动武装头子陈恭受的房子），各国代表也经常有人参加。周恩来同志经常到那里做政治报告，分析国内

【注】关于“两广区党委”名称问题，目前书报多采用这一名称。但据谭天度、林务农回忆：“记得一九二四年前后，党南方组织名称系‘广东区党委’，管辖范围是广东、广西、福建三省，代号为‘管东渠’，曾发出许多文件，都署名‘管东渠’。”

外形势，很受大家的欢迎。

罗明：我于一九二五年秋天来广州进广东大学读书，兼任全国总工会《工人之路》驻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采访员，接着又兼任两广区团委宣传部干事，在杨善集书记兼宣传部长领导下工作。当时区党委和区团委设在文明路两间挨近的大楼，我常有机会看到周恩来同志在区党委开会和办公。一九二六年四月，我在两广区党委宣传部任秘书，更是经常和各部委秘书一起列席区党委会议，倾听周恩来同志和陈延年同志的指示。陈延年同志对周恩来同志是很尊重的，讨论研究问题时，也很尊重周总理的意见。当时，周恩来同志除担任区党委的工作外，还兼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我们从周恩来同志所发表的讲话和处理事情，都很明确地认识到，他是遵照党“三大”毛主席所提出并经大会决定的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反帝反封建反买办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扩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策略思想的。一九二五年秋天，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派凶手暗杀坚持国共合作、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时，周恩来同志在报上发表了悼念廖先生的文章，愤怒地谴责了国民党右派暗杀廖先生的罪行。

周恩来同志很重视工人阶级在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我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当采访员时，就近得悉周总理与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发、刘尔崧等同志一起领导了“五·卅”、“六·二三”以来蓬勃发展的省港罢工运动。还从各

方面支持工人纠察队，使工人阶级的武装力量逐步巩固和扩大起来，成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的重要柱石。

周恩来同志在区党委时，也很重视广东大学的学生运动。当时在学生群众中，左派学生的组织“新学生社”，与右派学生的组织斗争很激烈。周恩来同志和陈延年书记为了争取团结多数，扩大革命势力，和区团委商量让“新学生社”自动宣布结束，统一学生运动。学校党团支部遵照区党委的指示：扩大左派，团结中间派，孤立国民党右派，成立学生会，领导学生群众参加革命运动。由于区党委周恩来同志、陈延年同志的正确领导，学生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时，广东大学经过党团支部和学生会的宣传活动，许多老师和学生都随军出发参加东征，为消灭军阀陈炯明残部、收复东江、统一广东、巩固革命根据地出力。

毛主席于一九二五年秋重来广州，主编《政治周报》，写了很多论文，痛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周恩来同志和陈延年书记经常同毛主席联系，商讨两广区党委的工作。毛主席在广州筹办全国农讲所，把党领导的开办了五期的省农讲所，改为全国农讲所（即第六期），为开展全国农民运动、领导农民武装斗争培养干部。周恩来同志和陈延年书记很重视农讲所的工作，经常到农讲所做报告。区党委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份派干部到各省为农讲所招收学员，也派我到福建厦门招收学员，为开展闽西和闽南的农运培养干部。准备和各省一起开展全国农民武装斗争，配合和支持北伐战争。

林增华：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同志回到广州之后，有一段时间经常到平民教育委员会来，关心了解“平委”的工作，并在那里写文章办公事。“平委”是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主办的，主任委员由当时广东省教育厅长许崇清兼任。办事处设在小东门的关帝庙内，地方宽敞，而且位置正当越秀南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即惠州会馆旧址），与文明路中共两广区委员会两处通道的中间，一些同志到这两地开会或工作时，常会顺便到里面走走。谭平山是到得最多的一个。周恩来同志在去黄埔军校工作之前，就以“平委”办公厅旁边的一间小房间作临时办公室。当时我担任“平委”实施部总干事，每天除上午去广东大学上课外，下午和夜间都到“平委”办事，所以常有和周恩来同志见面的机会。后来他到黄埔军校工作，就没有经常来了。只是有时从黄埔回来时，还来“平委”走走。因为自从广东省妇女协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以后，有一段时间，会址也暂时设在关帝庙内。周恩来同志与妇协的负责人邓颖超、蔡畅同志、以及青年军人协会的负责人王一飞、李之龙等同志来往都很密切。这也说明，周恩来同志虽然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时候，对“平委”这样的革命群众团体也还是很关怀的。

二、在黄埔军校

吴宗太：周恩来同志是一九二四年秋天到黄埔军校当政

治部主任的。一九二四年十月商团事件以后，我从孙中山先生的警卫部队调到黄埔军校当炮兵区队长，刚到职不久，周恩来同志便亲自来到我们的营房，找我和另一个区队长谈话，详细地询问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还向我们讲解当时的革命形势，鼓励我们好好工作和学习，勉励我们进步。谈话虽不到一个小时，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非常深刻的。以后因工作关系，我和周恩来同志接触不多，但从平时所见所闻，知道他在黄埔军校的工作是非常艰巨的，而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又是非常出色的。当时正当黄埔军校建校之初，广东革命根据地正在开辟，革命政权尚未巩固，环境非常复杂，除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公开干涉外，在革命内部也还存在军阀霸占地盘、各自为政、不听命令的局面；国民党内部则存在一股右派顽固势力。所有这些情况，也影响到黄埔军校内部。蒋介石从一开始便伪装革命，窃取黄埔军校校长的地位。在军事训练方面，极力搜罗日本士官和保定出身的旧军人，并拉拢其同乡、同学、同事，培植起一个忠于他个人的右派集团，其公开的为首分子是王柏龄（当时任教授部主任）到一九二五年底，他们更公开成立所谓“孙文主义学会”，进一步搜罗校内校外的反动势力，与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的左派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并派出流氓打手，四出袭击共产党员。他们利用职权和各种卑鄙手段，妄图把整个军校的师生，以至教导团全部士兵拉拢过去，以扩大其右派反动势力，控制整个军校。此外在军事上、经济

上，他们也处处进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斗争是复杂尖锐的。当时周恩来同志是政治部主任，肩负党的重托，要把军校建设成为培养人民革命武装的基地，任务是十分困难艰巨的。在党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以永不疲倦的工作毅力，紧紧依靠群众，注重调查研究，不断地克服困难，并通过艰苦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不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把大多数的学生和士兵团结在党的周围。一九二五年初，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举行第二届执行委员选举时，身为校长的蒋介石竟因得不到应有的票数而丢了执委的衔头，以至气急败坏地直骂其亲信喽罗为“饭桶”。可见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进步势力的积极斗争下，右派反动势力孤立到何等地步。

苏怡：一九二六年五月间，我在北京奉党的北方局派遣，来广州参加工作。当时大概是由于我在北京时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三·一八惨案纪实》的文章，又经邓中夏同志（是我在北大时的同学，当时在广州总工会工作）的介绍，所以来到广州后，两广区党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就决定分配我到党的军委会工作。他同我作了简单的谈话之后，即要欧阳继修同志（即阳翰笙，当时是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秘书）领我到周恩来同志那里报到。

周恩来同志当时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也是党的军委会负责人。我们来到万福路一百九十号三楼周恩来同志家中，幸福地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当我走进客厅时，心情顿时紧张起来。但是不多一会，他那笑容可掬，并无半点

领导人的架子；握我的手时，又是那么有力，没有半点领导人见小同志的神气，就使我慢慢轻松下来。欧阳继修同志介绍我：“这就是周恩来同志……”，还来不及介绍我叫舒治平时，周恩来同志就马上接着说：“你就是治平同志，好！请坐，你的情形，我都知道了。我很忙，就得要出去了。你们先谈谈。以后到入伍生部去，那儿的工作很重要，你好好地干。以后更要多与荣臻、继修同志多多商量，以后再谈吧！”说后就匆匆出去了。当时聂荣臻同志不在场，我和邓颖超同志、麻植同志、饶乃杰同志、穆世济同志一起谈了一会，就告辞了。经过这一次接见，我便被分配在黄埔军校入伍生部工作，具体职务是政治宣传科上尉编辑股股长，主要工作是编辑一份《先声旬刊》，以后在那里工作约半年之久。

那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正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过后不久。黄埔军校内由于国民党右派的挑动破坏，斗争已经十分复杂尖锐。周恩来同志站在斗争的前列，应付各种非常事变，而且还正在举办一个干部训练班〔注〕，工作是十分繁忙的，可是还能抽出时间来看我在北京时写的文章，研究我的问题，态度从容地和我谈话，细心安排我的工作，这实在

〔注〕据当时参加训练班的黄淑反映：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擅自把党代表和政工人员赶出他控制的第一军。周恩来同志为了保护革命力量，把这些人员集中起来，办一个训练班——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学员二百多人，地点在惠福西路的大佛寺，时间约一个月，以后陆续分配到各个党、政、军单位。

使我非常感动。

过了不久，我到东皋大道农民协会去听报告。当时，农民协会每个星期日都举行报告会，请党的领导同志如陈延年、恽代英、肖楚女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做专题报告。那次报告是周恩来同志做的，听报告的人有黄埔军校的人伍生，有国民革命军一、二、三、六各军的军官，其他还有一些工会、农会的活动分子。周恩来同志在报告中，详细地讲述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还严格地批评了国民党的一部分反动势力，对我党内的一些错误政策措施也作了批评。他对国际上的帝国主义情况，对国内军阀的一举一动，是那样了若指掌，分析起来，逻辑性很强，头头是道，紧紧地吸引着听众，虽中间没有休息，但会场中却始终鸦雀无声，几乎连一声咳嗽也没有。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对我们的启发教育很大，印象也是十分深刻的。

在军校期间，周恩来同志不仅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和措施，常常毫不客气地给予指责，特别是对国民党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周恩来同志曾多次进行公开批评，指出它是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背道而驰的，是造成国共两党不团结的祸根。我和人伍生部政治部的政治教官黄先谦、张庆孚等同志听到后，还感到他批评的话太露骨了，担心将来有危险。此外，周恩来同志对鲍罗廷和陈独秀的右倾思想也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的政策是“小老婆”政策，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所有这些，今天看来正是周恩来同志勇敢、正直、大公

无私的革命斗争精神的表现。

我在军委半年多的日子里，从未见过周恩来同志对自己同志发过脾气，他对自己的同志总是那么循循善诱。同志们有缺点错误，他进行批评时，也是公平正直地摆事实讲道理，使对方很心悦诚服。记得欧阳继修当时同周恩来同志是很谈得来的，但有一次他不经请假，私自跑去上海结婚，后来回到广州，周恩来同志就给他以严厉的批评，还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对这件事，当时我们都非常赞成，并佩服周恩来同志的严明正直，而欧阳继修本人也是毫无怨言地接受了。

魏鉴贤：一九二五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我在国民政府的铁甲车队当学员。这个车队建立于一九二五年春，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派徐成章、周士弟、廖乾五、莫奇标等共产党员作为骨干而组成的，人数只有一百二十多人，但都是从各地挑选来的工农子弟，队伍是很精悍的，是我党控制下的第一支革命铁甲车队。车队成立以后，驻扎在大沙头飞机场，从事训练和警戒，但也经常出发参加各种重要的军事行动，例如支援广宁农民镇压地主恶霸；支援省港大罢工工人的斗争；配合两次东征肃清陈炯明的叛军；配合镇压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以及封锁香港保卫边防，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秉承党的意图，听从恩来同志的命令进行的。所以干得很出色，部队成长快，也深得工农群众的支持和爱护。

在这期间，我曾多次幸福地见到周恩来同志，地点都是

在文明路他的办公楼上，是跟随廖乾五同志去的。廖乾五同志是铁甲车队的党代表，他是山西人，初到广州，听不懂广州话，每次出门总是要我随行，为他作响导和翻译，同时也兼事保卫工作。所以每次到周恩来同志那里会报工作也都带着我去。周恩来同志的多次接见，使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那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工作勤勤恳恳的高贵品质，以及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每次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既没有见到保卫人员，也很少看见其他工作或勤杂人员，是他亲自接待我们的。他的房子陈设非常简朴，一张方形的木桌和几张长凳放在房子正中，是开会和客人来访时用的，进门墙角处放一张小茶桌，上面只有一个茶壶和几个杯子；当街的墙角放着一张洗面台，此外就是一张靠窗的办公桌，桌上除了一个公文包，就是一套笔墨和许多书刊报纸，如此简单的陈设，即使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也是使我们感到惊讶的。可是对此，我从来没有听周恩来同志说过半句抱怨的话，也许他所想的都是工作！工作！有一次我们去得特别早，来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修胡子，见到我们进来，就一面招呼我们坐下，一面说：“我这个胡子很讨厌，天天得要修，占去我很多时间呀！”他很快把胡子修好，就坐下来和我们谈话了。周恩来同志对待同志，以至我这样的小兵，都是态度和蔼、热情亲切的，每次我们到他那里，总见他满面笑容，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天气热时还亲自给我们倒茶递扇子，弄得我们都很难为情。现在时间虽然过去五十多年了，

当时周恩来同志接见我们的情景，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周恩来同志对待工作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每次廖党代表会报工作时，周恩来同志总是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廖党代表，全神贯注地聆听。我不止一次地听周恩来同志谈到：铁甲车队是一支很好的部队，要爱护它，努力把它培养成为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骨干。铁甲车队就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在不到一年的训练时间里，部队的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在同年冬，部队奉命结束，全体人员编入叶挺同志的第四军独立团，就成为该团基层骨干。

三、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 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曾天节：一九二五年二月初，周恩来同志任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亲率黄埔学生军，参加扫荡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三月间，经过海丰、陆丰，在棉湖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后，取道安流直趋五华、兴宁、梅县地区。学生军所到之处，开展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为口号，发动青年学生和广大工农群众，掀起扫荡陈炯明军阀的人民战争怒潮。三月中旬，周恩来同志率领学生军到达五华，立即召集五华中学师生讲话，唤起广大师生参加东征军的军事政治活动。在周恩来同志的发动下，